

# 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

行 龙 胡英泽

**摘 要：**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3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经历了整体社会史、区域社会史、新社会史三个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不断反思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三十而立，回顾与前瞻同样重要。

**关键词：**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 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10) 01-0140-10

**作者简介：**行 龙，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胡英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山西 太原 030006）

学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和发展，可能是史学界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经过 30 年的实践，社会史可谓中国史学界最为活跃的领域了。在这 30 年里，从社会史的复兴到区域社会史，再到新社会史，中国社会史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摆脱政治史的强音到新近的回归政治史的呼吁这样一个往复过程中，透露了哪些最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观念？在面临挑战、不断争论的反思过程中，社会史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对开启一个新的阶段提供参考？这些就是本文的出发点。

## 一、社会史的复兴

1978 年，发生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成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标志。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若干松动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各个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均进入了破茧而出的“新时期”，社会史的复兴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社会史发出的最强音。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呼吁是对史学研究浓厚政治意识的“工具论”的淡化，是对“五种社会形态”、简单线性进化论和近代史“三大高潮、八大运动”的革命史范式的反思。

在这样一个时期，社会史学界有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使命。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应该说那么一场大讨论，出现了一个社会史的资料整理的一些有关社会史的书目，但是毕竟不是我们所说的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史。这种回溯原点的努力，更多的具有论证开展社会史研究合法性的色彩。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的社会史大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极为复杂，如果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视野来

收稿日期：2009-10-16

看,其中一些常常忽略却至为关键的线索,仍然可以提供对1978年以来社会史的发展过程的思考。其一,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赋予了他们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意识,将中国的历史“概念化”了,一些重要概念即来自于社会学。其二,史学家对中国革命性变革的现实关注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其三,研究者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和上述问题密切关联的是历史研究的社会学倾向,20世纪20年代,关于社会和社会问题著作的突然增长,是此时中国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学转向的最明显的表征。大、中学校社会学和社会问题课程的设置以及政府性机构和社会学组织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不仅提供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具体资料,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待历史的观点日益在20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简言之,社会史与社会学理论的密切关系,现实关注与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社会调查与资料搜集等一些和社会史研究有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已显露出来。

1978年后的政治、社会和学术形势与二三十年代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从社会史复兴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来看,却有旧知新识之感。1979年3月,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开始走出被否定和批判的禁区,并积极展开了一系列推动社会学重建的工作。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我们需要对当前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帮助党和国家解决一些急迫的社会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减少一些前进中的障碍,使社会的各方面都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地向前发展。”如果说1978年以后,“解放思想”扫清了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的障碍,社会学的重建对社会史复兴的推动和促发作用也不容忽视,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密切关系重建成为可能。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于历史学自身的反思,从1978年开始社会史研究已经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此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讨论、定期举办学术会议、成立研究机构、开设课程、著作出版、人才培养等工作逐步展开。1985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讨论。1986年由南开大学、山西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共同发起,在天津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讨论内容集中在社会史研究对象问题等方面。这次会议可以看作学术界有计划地恢复社会史研究活动的开始。此后,每两年一届的社会史年会坚持不懈定期召开,至今已连续举办11届。200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多家单位共同发起召开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亦以两年一届为期,现已召开两届。为推动社会史研究,山西大学等高等院校成立了社会史研究所。为培养社会史研究工作者,1978年开始招收首批硕士研究生后,一些高等院校即已开始培养社会史研究方面的人才,198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确定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部分高校开设了社会史研究课程。20世纪80年代后期,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社会史丛书4种,浙江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合作,组织出版了中国社会史丛书20种。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几部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史的著作出版,才标志着中国社会史体系的初步形成,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一次高潮。1992年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学界虽有批评之声,但从当时社会史的发展状况来看,它毕竟“使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实际操作的第一步,并成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张静如教授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龚书铎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等几部各有特色的通论性社会史的著作先后出版,在当时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划出了一个比较明细的研究范围,或者说是一个大概的研究范围。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费孝通:《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载《费孝通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他们的研究展示出来的意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如何把所设计的社会史的理论框架和史实结合起来,把它容纳、贯穿到通史和断史的著作当中,从理论的层面开始到实际的操作,使得社会史的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

一个学科的兴起势必要讨论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框架等问题,社会史亦复如此。“社会”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区分,又有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兼有“多维一刻”的时间流动性,加之西方社会史兴起过程中本身的争论,使得不同的学者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提出了观点。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基本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应该以社会生活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如冯尔康先生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提示它本身在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作用和地位”。乔志强先生提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它“不属于人类生活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社会生活”。其二,认为社会史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如陈旭麓先生则提出社会史应该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面貌”,“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张静如先生认为,“社会史不是研究‘经过政治、经济提取后的剩余物,而是研究社会全部的历史’”。

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研究框架和研究对象紧密联系,代表性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乔志强先生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平行相邻的从属于通史的专门史。社会史研究体系由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三部分构成,是为“专史说”。陈旭麓先生不同意把社会史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专史,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嬗递。张静如先生提出“社会史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历史学中层次最高的部分,是立于各类专史之上的学科”,他不同意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分离出去。其著作从社会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社会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方面建构社会变迁的整体状貌。陈、张二人观点是为“通史说”或者“总体史说”。后来,赵世瑜教授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后来,他继续阐述了这一观点,提出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史学的范式,而不应该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是为“范式说”。常宗虎曾写过一篇文章,否定中国社会史学科存在的意义,把社会史的研究视为一种方法。其后,行龙撰文指出,社会史的“范式说”和“专史说”并不矛盾,更没有高下之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来讲,社会史就是一门专史;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看,社会史以它鲜明的总体史的追求,追求一种总体的历史研究,自下而上的视角,还有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总体史、自下而上、多学科的方法这几个特性来看,社会史为旧史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其实这个问题,西方社会史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年鉴学派的大师布洛克就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他说一门学科并不完全通过它的对象来被定义,不管哪一个学科,并不是通过它的研究对象来定义,它所具有的限制也完全可以以其方法的特殊性质来被确定。可以说,对社会史这些基本理论的讨论推动了整

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赵世瑜:《中国社史研究笔谈: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行 龙:《也谈社会史的“专史说”与“范式说”》,《光明日报》2001年7月3日。

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

社会史相关问题的讨论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的某些重要概念、理论,反映了从历史学科出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看来,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史的讨论涉及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研究内容等广泛问题,促进了社会史的发展。但是,复兴之初的社会史起步晚、底子薄,所倚重的社会学也面临着重建,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史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双重的局限。加之西方社会史并非一个同质体,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分歧。上述讨论毕竟局限于历史学界的讨论,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上述原因致使在社会史讨论过程中,对于相关概念的理解和把握、研究框架的建构等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史应该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是现代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列的从属于通史的一项专史,主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以及动态的变迁。社会史要获得长足发展,须注重与社会学等其它学科实现科学的整合。历史学和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相关问题的讨论,充分显示了社会史学科交叉性的特征。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是学术界对开展社会史研究发出的呼唤。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教条主义和“左”倾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和“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1978年后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学界肯定了它作为一个改革创新、别开生面、突破旧框架的角色,但对于社会史在中国史学的作用的认识是,政治、经济、文化之外的边缘地带或空白区域留待它开拓,以往史学苍白干瘪的形象,由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

随着社会史学的发展,社会史学界并不满足于这样的状况,他们“不赞成社会史只是传统史学领域的拓宽,是历史学分支的论点;相反主张社会史为了取得自己成长所必需的独立学术地位,目前急需下决心割断传统史学的脐带,在一种新学术氛围中发育壮大,拓开自己的路。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史首先应该作为传统史学的叛逆角色出现在学术舞台上”。随着社会史学科性质讨论的展开,人们对于社会史学科性质的认识日趋成熟,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最终拥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来看,有人将这一时期社会史发展的特征总结为“闹独立”、“争地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史发展的大致状况。在丰满历史的内容的同时,却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骨架。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其实汇聚了两种不同的学术资源,也反映了怀旧和趋新的心态。把社会史复兴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及其产生的论著,是为怀旧。作为另一个资源,法国年鉴学派自下而上视角、整体的(全面的)历史、长时段等概念几乎成为趋新的潮流。亦步亦趋的中国社会史试图在和国内、国际学术实现对接的过程中,似乎是方枘圆凿。一方面但从严格的学科意义上来看,社会史论战和社会史研究尚有较大距离;另一方面,我们所要倡导的法国年鉴学派已经“时过境迁”,发生了学术转向。这样,接上了断骨、撒上旧方的中国社会史埋下了不少隐忧,在所难免。对此,孙江指出:“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加以追求的目标!”

周晓虹:《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王家范:《中国社会史学科建设刍议》,《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二、区域史、历史人类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复兴之后面临着新的选择。初步建立了社会史的研究框架后,已不能局限于单纯理论、概念的“坐而论道”,也不能停留在宏观的、一般的“大而化之”的研究层面,如何实现突破它而走向深入,成为社会史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史研究发生了区域转向,社会史研究从整体社会史迈向区域社会史,反映了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又一个新潮。

应当说,我国素有地域研究的传统,但是把区域社会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有针对性地进行全面系统地探索,却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区域社会史之所以能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具有多方面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经济普遍发展起来,但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共同富裕的观点来看,显然值得重视。因此,寻找不同区域的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费孝通先生针对全国各地的差异而总结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各类发展模式,以及区域经济发展设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于社会史研究者来说不可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中国幅员辽阔,受经度、纬度、垂直地带性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既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地域特色,又存在着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近代这种不平衡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而表现的更为突出,这种差异还导致了另一种不平衡性,即沿海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消融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展开,沿海地区的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较早开始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进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萧凤霞、科大伟等人的合作研究,从宗族、宗教的角度考察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区域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重视。

如果从“学缘”来看,区域研究在法国年鉴学派著作中也占有相当比重,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似乎顺理成章。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性成果的引进,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发展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尤以美、日学者的影响较大。施坚雅的研究就是地理学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他在有关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晚清中国城市的研究中,引入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使历史研究更显空间性与立体性,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不少学者针对施坚雅的理论提出了批评,但区域理论和分析方法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第一,社会史研究需要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研究,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空间结构。第二,区域结构不仅是一个空间结构,也是一个时间结构,要注意区域研究中空间、时间结构的差异性。第三,市场及区域理论有助于中国区域类型比较研究的发展,有助于从整体和区域差异来认识历史。

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史界的流行语。柯文写作该书时,其“心目中的读者主要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所讨论的问题主要也是针对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争论的焦点。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存在诸多局限,有批评者认为这一取向本是针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大陆的“学情”,中国学界对近代史的研究,向来注重本国内容而忽视“冲击”中国的外国因素,本应该揭示或发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历史”,即从提问层面关注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想所为。还有学者指出它是在历史变化

费孝通:《农村 小城镇 区域发展》,载《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罗志田:《发现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化)论”以及在历史变化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形成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错把冯京当马凉”,柯文所主张的内部取向和区域系统研究却成为中国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1994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学会第5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社会史学界首次对区域社会史的理论、方法、意义进行全面系统讨论的开始。田野调查的队伍在争议中日渐壮大,多学科渗透方法广泛利用。这次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实现了与国外社会史界的正式“接轨”,社会史学术会议开始出现了英、法、日和香港地区学者的身影。

此后,社会史年会以及各地举办的相关学术讨论会,议题多聚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相关的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如中山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等单位成立“华南地域研究会”,山西大学成立“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心”,安徽大学成立“徽学研究中心”等。围绕区域社会史研究诸多问题,有针对性地召开了系列会议,如“山西区域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等。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继产生了一批成果。主要有王笛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版),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乔志强、行龙主编的《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魏宏运主编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朱德新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与此同时,国外尤其是美国学者黄宗智、杜赞奇、马若孟、彭慕兰等人的著作也相继译介到中国,对区域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史研究学术格局,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多地受到人类学的影响,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看两不厌”,对共时性“结构”与历史性“过程”的关注使两者渐行渐近,中山大学更是树起了“历史人类学”的旗帜。他们在把握历史内在脉络的基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现在的问题意识出发,从宗族、绅士、族群等入手,研究地方如何纳入国家及其复杂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大学联合相关单位有组织、有计划定期在华北、华南等地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通过专题讲座、田野调查等形式,对青年学者、研究生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资料搜集与解读等方面的培训,扩大了“历史人类学”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影响。山西大学在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则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其中“以水为中心”水利社会史就是一个努力探索的重要方向。他们是以水利为切入点,思考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通过水利灌溉、民生用水、水土流失等不同类型的研究,关注各类因水的问题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而研究社会运行、控制、冲突与变迁等,尝试建立“以水为中心”的区域社会史解释框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形成一个较大的群体。

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田野调查蔚然成风,形成与自身研究相契的“走向历史现场”、“感觉主义”、“走向田野与社会”等学术倡导。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的相互关系似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第一,不少研究成果其实可以上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们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如施坚雅的市场研究与在四川农村的调查,费孝通在长江三角洲的农村调查等。第二,早期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行龙、杨念群:《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的社会学调查为历史研究和田野调查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如1940—1942年的日本在华北农村的惯行调查,后来就衍生了一批以当时惯行调查与后来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成果。第三,人类学的历史学转向,即对于历时性过程的关注,使双方有了共同讨论和对话的可能。第四,田野调查使得大量地方文献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这些都扩大了田野调查的影响。

“田野工作”在人类学占据重要地位,在历史研究的视野里,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学术传统不同的研究群体在具体实践中赋予它什么样的内涵?应当说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不同的,历史学强调史料,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以及口述资料。对于田野调查所具有的搜集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学术训练等多重意义,研究者形成共识。但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第一,历史学的田野调查中应该更加注重文本资料的搜集,即“抢救式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在把历史文献的搜集和参与观察结合起来的同时,加强中国社会史研究资料的积累和建设。第二,田野调查孕育新课题的意义,尤其对于一些文献记载缺乏的研究课题必须坚持田野调查。第三,田野调查不仅要注意学术意义,而且要有自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关注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田野与文献的结合、微观与宏观研究的结合,避免出现“为田野而田野”的简单化倾向。

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展,围绕它的学科定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形成一定的共识。对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大致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这和当初社会史学科讨论有些相似,我们认为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方向,是从区域的视角研究社会史。

虽然区域社会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区域概念的界定和讨论,其中一些观点或许受到了区域理论影响,对区域的界定、表述和地理学、区域科学有些方面比较一致,但并没有鲜明强调地理学、区域科学有关区域的理论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科学规范意义,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引起学界的反思,强调区域的同质性、系统性、独特性。也有研究者认为区域因研究者的问题而定,应该淡化区域。

研究者强调区域社会史不等同于地方史,区域社会史虽然限定在某一区域,但它决不是地方史,或者说通史的地方化,不是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在具体研究中要采取多学科方法,尤其是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

区域社会史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克服。

第一,区域和整体,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相加并不等于整体社会史,也代替不了整体社会史。虽然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从社会的视角理解政治,但人为的区域化分割研究形成的“盲人摸象”的局面,对研究整体历史造成了很大障碍,尤其是近代以来跨区域的广泛的政治动员,从区域社会出发是难以理解的。

与此相联,常为人所诟病的是研究问题的“碎化”。“碎化”和研究内容的细碎、缺乏对大历史的关照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症结,我们的理解是,“碎化”不怕,怕的是碎而不精,区域大小也无忧,忧的是在小的研究中,是否抱持大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社会史的一些精典之作就是以小见大。这个问题其实牵涉到区域和整体、微观和宏观、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对此,我们以费孝通先生已经作了很好的回答。在小与大、偏与全方面,费先生提出研究不同“类型”、“模式”的概念,可以达到接近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他还强调,在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而成的“总数”,同一“整体”的个体是整体的复制品,就像从同一个模式里印刷出来的一个糕饼。这种认识应当说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同样适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区域本身,而是从区域的角度理解大历史。

第二,区域社会史和年轻一代学者的培养。陈春声曾谈到,随着区域社会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加入其列,对于他们而言困扰上一辈学者“区域”的代表性、合法性,

微观与宏观的关系等问题,已经不是新生代研究者的顾虑。区域社会史研究要么是通史的地方版,要么是强调特性的地方性知识,严重缺失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

区域社会史在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拓展史料范围、培养研究者的实践能力等方面形成重要影响。但同时产生了负面作用,传统史料少人问津,典章制度束之高阁,资料堆砌大于问题意识,田野调查代替学术训练。在看到区域社会史研究一派繁闹的同时,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努力加以校正,否则将对未来社会史研究产生难以估测的消极影响。

### 三、新史学、新社会史、重归政治史

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史经历了20年的发展,区域社会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学术积累,研究者在基本放弃了复兴之初那种宏大体系的建构后,转向区域社会史研究,它虽然为各种模式提供了实验场,营造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其学术品位和理论对话能力仍然较弱,还不足以形成自己鲜明风格和具有原创能力的解释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新社会史”、“新史学”、“重归政治史”等学术方向。

中国社会史研究群体并非一个单一的均质体,可谓“众声喧哗”。第一个群体是国外研究中国史的学术群体,尤其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为著,他们善于具体经验与抽象概念的联结,提出一些概念和解释框架,如“内卷化”、“文化的权力网络”、“陌生人”等概念层出不穷。第二个群体是具有国外学习背景或与国际学术交流较为活跃的群体,相较而言,他们对国外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概念有客观认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采取批判的立场,试图摆脱西方理论概念的笼罩,追求本土化。第三个群体则对西方理论相对隔膜,中国历史具体研究中,对于西方理论概念的运用有“生吞活剥”之嫌,缺乏批判和对话意识,结果沦为西方理论概念的注释。第四个群体则不太注重理论概念,强调史料搜集、铺排、考据的重要性而淡化了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提炼,“地方性知识”并没有成为经验与概念连接的桥梁。对于前两者而言,是打着理论的“灯笼”找史料,第三个群体是盲人打“灯笼”找史料,而第四个群体则是扔掉理论的“灯笼”找史料。

这种学术生态的形成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社会史在内的中国史学发展受到西方几种大的社会思想有关,影响较彰的有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这些理论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重新建立了中国史尤其是近代史的解释框架,也改变了研究者的提问方式。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在脱离了原有语境时,在中国社会史具体研究中产生了非常复杂的效应。

杨念群曾指出,那些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很有影响的模式并没有进入史学主流,也不存在美国中国学界所发生过的所谓方法论的阶段性问题。从中国史学而言,从革命化到现代化的解释模式并没有发生断裂,恰恰是两者的相互衔接和包容导致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危机。原因是我们没有在“革命”之外营造出自己的解释空间,创造出基于本土经验的“中层理论”。所以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使中国历史的解释趋于多元化是最为急迫的课题。

“新社会史”难以撇清和以往中国社会史的关系,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它更多的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不满和反思。它不是一个范式转化概念,也不是一个简单分类范围的概念,应是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更为重要。它是要在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式论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史之所以始终形不成系列概念化方法去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在于缺乏有效的“知识共同体”和相互驳难氛围所导致的创造性解释能力的递进式发展趋向,并成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从《空间·记忆·社会转型》这部标以

陈春声:《走进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杨念群:《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载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新社会史”的论文集可以看出,其文章并没有告别西方社会理论的意思,甚至有照搬硬套的痕迹,但却大多通过修正与反思的途径力图设问出个性化的“中国式问题”,并力图实现其本土化的转换。

虽然研究者努力开创别具一格的“新社会史”,但在具体理解上又存在一定差异。孙江先生认为,杨念群教授所指的“新社会史”亦新亦旧,构建和解构同时存在,既有关方法方法和重视结构的新史学现代主义特征,又有微观的、本土语境的新史学后现代化特征。在他看来,中国新史学的再生必须以清算自身的旧历史即放弃结构的整体史的叙述和下面回答后现代的挑战为起点,这才是建设中国新社会史的关键所在。中国“新社会史”第一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第二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第三是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它并非要以狭隘的民族话语否定美国中国学,而是要求指导美国中国学的文本与产生文本的现实语境结合起来放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

“新社会史”“新”在何处?从《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事件·记忆·叙述》到中华书局已出版了3卷的《新史学》所录文章,大致可以看出它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学术格局来看,它以摆脱以往社会史窠臼和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笼罩为旨,客观上形成了多元格局,有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自我反思以及国际学术对话能力的提高。第二,注重本土“问题意识”的提炼和“中层理论”的建构,在新的解释思路和叙事风格中,对于各类文本及其意义的解读得到提倡,如概念、事件、图像等成为研究对象,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新社会史只是代表了一个方向,可以说带有很强的“反拨”、“纠偏”色彩,由于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内涵,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理念。

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史(或者称“革命史”)与社会史相互关系的历史。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讨论中,社会史研究就是与社会性质、革命对象等问题紧密联系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史排除了社会史取向占据主导地位。颇可玩味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复兴,革命史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又遭受了遗弃的命运,在“社会史就是除过政治史的历史”的旗帜下,政治史原有的支配地位迅速下跌。20世纪90年代,政治史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虽然得到一定提倡,但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研究理念中,下与内毕竟是主要的,上与外不免沦为次要性因素,政治是作为理解地方而具有合理性的。从区域社会史从地方路径来理解国家政治的渗透过程,这对认识国家制度在地方具体的实践机制不无益处,但是这种碎化了的政治史却很难回答近代以来超地区的政治是如何的。

社会史的突破和政治史的复兴其实都面临着困境,重归政治史则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研究者强调,一方面政治史要从社会史的研究中汲取灵感,另一方面社会史要加强政治史取向的意识,不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意识,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社会实践、表象和仪式进行再研究,关注近代以来广泛而频繁的社会动员。

新社会史、重归政治史之外,这段时期中国社会史还开拓了不少新领域,成绩较彰的有医疗社会史、环境史等。相对于国外或港台地区,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可同日而语。人类与疾病相伴随,以往的疾病医疗研究基本属于医学范畴。人类应对疾病的医疗观念和实践也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行为和思想,进而广泛具体地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藉此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从社会史角度切入这一过去忽略的领域,可谓别开生面。这方面代表

孙江:《阅读沉默: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载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性的著作有余新忠的《江南瘟疫与地方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等。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它与环境保护主义有密切关联。后来环境史逐渐淡化了其环境保护的价值判断和批判色彩,逐渐与社会史靠拢。环境史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过去忽略的自然环境成为历史剧中的角色,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世界史研究者得风气之先,在译介环境史论著和提倡环境史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夏明方、高国荣、包茂宏、梅雪芹等人在国外环境史译介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他们并没有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环境史个案研究。目前,环境史的研究群体从大的方面来看,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群体,从史学领域来讲集结了农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世界史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成果。

#### 四、中国社会史的展望

以上对中国社会史30年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概略性的总结,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史的复兴和发展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0年前在“史学危机”中,社会史以反抗僵化教条的政治史、革命史,以改革创新的态度开始迈出自己的第一步,时至今日,已届“三十而立”之年。我们应当看到,为了避免陷入新的教条和僵化,中国社会史从来没有放弃过自我的批判与反思,也惟其如此,中国社会史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日益成熟,我们相信以下几个方向可能成为新的亮点。

其一,一些领域仍有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环境史(有人称之为生态社会史)强调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历史的探讨,让长期受到忽视的自然环境登上历史舞台,相信有不少个案性的研究把环境史研究引向深入。医疗社会史研究还会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城市社会史的研究也会引起更多关注。

其二,“新政治史”、“新革命史”将成为社会史在回归政治史后的一个重要方向,结合了社会史取向的政治史研究有别于旧政治史、革命史研究,必将推动对历史上的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其三,把社会史引入当代中国研究,我们称之为“集体化时代”研究。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近年来我们搜集到数以千万计的有关集体化时代山西乡村社会的基层档案资料,多为村一级原始档案。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他们的研究更多地依靠分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广播报道、移民访谈;对于国内学者来讲,更多的还是利用上层的会议、文件、档案等,我们所占有的资料则是最贴近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来的历史图景将更为真实、生动。

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打破僵化、求新求变的代名词,而沙尘暴、“尘暴”与环境史,“非典”与医疗社会史,这些学术关键词也为社会史贴上了对社会变迁的敏感捕捉和强烈现实关怀的标签。我们期待着更加成熟的中国社会史。

(责任编辑:王恩重)

评审意见:文章比较全面、系统而有分析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叙述了社会史复兴的状况,介绍了区域史、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特点,分析了最近十年来新史学、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影响,对于社会史的未来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文资料扎实,信息量大,对社会史演变的分析自有学理。论文逻辑清晰,表达准确。

评审专家: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余新忠:《江南瘟疫与地方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theory which regards that the second distribution is a reciprocal process of different groups. That concern about the vulnerable groups should not only be on the base of morality, but also on the base of compensation justice.

Keywords: Distribution justice; Political justice; Cos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second distribution; Compensation justice

### **Community and Morality: on Macintyre's Pursuit of Community Tradition**

Zhang Huina Lu Feng(114)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abbey, the essay wants to illustrate that the Order of St.Benedict, set up by St.Benedict, made tradition of Aristotle in Greek and Roman culture and community preserved and continued in the war period; this convinced Macintyr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construct community and revive Aristotlian tradition. Macintyre asserted that only through abandoning the liberal individualism and reviving the community tradition of Aristotle, can western civilization solve the confusions in contemporary moral field. Benedict's success in preservation and continuing the community tradition made Macintyre believe in the possibility of reviving Aristotlian tradition; while as to the actuality of reviving it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Macintyre isn't optimistic at all; Macintyre knows the deep root of liberalism in western world and the difficulty in realizing his theory. But Macintyre's critique to liberalism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mmunitarianism is important.

Keywords: St.Benedict; Community; Aristotle; Tradition

### **On the Debate of Translation of Being and Its Influences**

Yu Xuanmeng(121)

Abstract Since the openness and reform, there was once a debate about translation of Being in Chinese western philosophy academic field. Though there was no unanimous agreement, such debate made a deep explor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Indeed, it also influe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Marxist philosophy,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compare study.

Keywords: Shi(是); Being; Ontology

### **A Commentary on the Thoughts of Wealth Disparity in Ancient China**

Zhong xiangcai(129)

Abstract In the ancient China, scholars mad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wealth disparity, some of them had theoretical depth. The requirement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wealth and poverty has showed a kind of cultural reason and moral power. Those positions that encourage people to be the rich are valuable thinking resources for our economic reform today. Meanwhile there are some clear shortcomings in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wealth disparity, which are obstacles to the natural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order.

Keywords: Ancient china; Thoughts of wealth disparity; Commentary

### **Thirty Years: on the Practice of Study of Social History in China**

Xing Long Hu Yingze(140)

Abstract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most promine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y study at present is the revive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It points out that social history study in 30 year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comprehensive social history; regional social history and new social history. Such process is a continuous retrospect and innovation process as well as a continuous maturing process.

Keywords: China; Social history; Study